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项目承担机构



洞 秋

2005. 10 (总第4期)

本 期 目 录

中心视窗 (1)

CRPE观察 (6)

热点透视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评
价与路径建议 (12)

时事评点

十六届五中全会描绘“十一五”
蓝图 (19)

主 编：史晋川
执行主编：叶建亮



C R P E

CENTER FOR RESEARCH IN PRIVATE ECONOMY,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3/05

中心视窗

2005.9.1 ~ 10.31



CRPE 《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系列丛书的第五辑出版发行

该书由金祥荣教授和叶建亮博士主编,是在金祥荣教授等研究人员近几年来主持完成的地方政府咨询报告基础上修改编辑而成的。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政府的经济社会规划战略研究,也包括地方政府专门领域的规划研究,还包括对浙江省经济社会总体战略发展演变的回顾评价。将这些“入世”的咨询研究编辑成书,除了系统地记录和积累已有的研究工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努力展现经济理论如何结合于实践活动的线索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分析视角。并以此不仅为实际工作者提供带有一定理论含义的参考资料,也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一些更为现实的素材,尽管这些素材的梳理并部符合理论工作者的规范。



中心 (CRPE) 2005-2006 学年工作会议举行

2005 年 9 月 20 日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外经贸楼 418 会议室召开中心 2005-2006 学年工作会议, CRPE 的专职研究人员和主要兼职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关于加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意识问题、关于 CRPE 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问题、关于 CRPE 进一步开展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问题、关于开展咨询工作问题、关于数据库和信息中心建设问题、关于培训和人才培养的问题以及 CRPE 的组织、管理体制的完善和社会工作的分工问题。通过此次会议的讨论和交流, CRPE 的有关工作人员更加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职责和努力方向。



兰溪、路桥“十一五”规划调研

2005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23 日,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以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为组长的“兰溪市‘十一五’经济与社会发展纲要”、“台州市路桥区‘十一五’经济与社会发展纲要”编制课题组一行 6 人分赴兰溪、路桥两地展开专题调研。课题组在与两地主要领导交换意见的基础上, 先后集中座谈、走访了 40 余个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对飞跃集团、吉利集团、双菱集团、联强机床、立马云衫、恒丰纺织、双灯家纺、中国日用小商品城等 20 余家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进行了典型案例研究, 就民营经济制度创新和发展中的家族制、专业化产业区、专业市场、创新模仿、配套体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功能建设、强化资源和环境支撑、加快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调研。同时, 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数据、现场访谈记录和问卷资料, 为下一阶段课题报告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册财务策划师 (RFP)” 高级培训班开学典礼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和香港注册财务策划师协会联合举办的“浙江大学注册财务策划师 (RFP)”高级培训班 (第一期、第二期), 于 2005 年 9 月 24 日上午在浙江大学外经贸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开学典礼仪式。举办双方主要领导参加了仪式并致词, 其中香港注册财务策划师协会会长冼伟超先生向学员详细介绍了 RFP 的发展历史、现状 (包括 RFP 会员在世界各国的分布状况) 及发展前景, 并耐心回答了学员的各种疑问。



詹姆斯·琼斯教授访问 CRPE

9 月 26 日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校长詹姆斯·琼斯教授 (Jones, James. F., Jr.), 应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的邀请, 于 9 月 26 日访问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 CRPE。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是美国最早建立的文科大学 (1823 年) 和全美著名的文理学院之一。

同日，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会见了詹姆斯·琼斯校长，并就两校合作和开展学术交流，建立稳定的校际关系等事项进行了友好交谈。出席会谈的有史晋川教授、三一大学经济系文贯中教授、经济学院肖文教授。此前，文贯中教授与 CRPE 已有合作项目，此行将就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作与交流。



国际化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召开

由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化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10 月 23 日在杭召开。来自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日本及北美一些著名高校及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及研究机构，我校及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发展改革规划研究院等本地部分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五十多位海内外学者、专家，就这一论题进行了既有一定专业深度又不失现实指导意义的探讨与交流。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到会致词。日本立命馆大学平田纯一教授、郑小平教授、法国里昂大学 Jean Ruffier 教授、北京大学萧琛教授、复旦大学尹翔硕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陈建教授、南开大学周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贺力平教授、浙江省社科院方民生研究员、浙江省发改委刘亭主任等与会专家及赵伟教授，先后作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企业国际化理论最新发展与全球企业国际化最新趋势、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与路径选择及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绩效与典型案例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国内与国外以及学术界与政府、企业界学者们的思想交锋为今后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赵伟教授的总结发言之后，会议在和谐、友好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此次研讨会属于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的“211 工程”研究项目——民营经济与国际化发展实施重要内容之一，该项目由赵伟教授主持。史晋川教授任项目总负责人。



日本立命馆大学平田纯一部长、郑小平教授访问 CRPE

10 月 24 日下午, 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部长平田纯一部长、郑小平教授应邀作到 CRPE 作了学术报告, 并拜访 CRPE。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民营经济与国际化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CRPE 秘书长汪炜副教授与两位学者深入探讨了两校在民营经济领域进一步合作的相关事宜, 并介绍了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科研情况, 同时聘请郑小平教授为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民营经济国际化方向联席负责人。两校学者共同认为, 在民营经济研究领域存在诸多合作的机会, 并确立了相关合作课题。



“中国民营金融与民间资本论坛” 成功举行

“中国民营金融与民间资本论坛”于 2005 年 10 月 20 日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科馆举行。论坛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江万龄国际经济与金融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金雪军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教授致开幕辞, 浙江大学江万龄国际经济与金融投资研究中心理事长江赵兰润女士致答谢辞,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到会并致辞, 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代表 CRPE 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丁敏哲主任和中央银行金融稳定局徐忠处长分别做了精彩的演讲。最后,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江万龄国际经济与金融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金雪军教授作总结发言。



CRPE 与 CSES 合作项目“杭州模式”第二次调研活动启动

10 月 26 日, 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社会研究中心 (CSES) 组成的“杭州模式”联合课题组在杭州开始为期 21 天的第二次调研活动。此次调研获得了杭州市领导和有关部门、企业的大力支持。课题组将先后与王国平书记、孙忠焕市长等市领导座谈、走访 11 个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同时与杭州市 12 家知名民营企业进行深入访谈。此次调研活动将积累

大量的统计数据、现场访谈记录和问卷资料，为下一阶段课题组进一步开展调研活动及研究报告的撰写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国平书记会见“杭州模式研究”课题组专家

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于 2005 年 10 月 31 日在杭州会见了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研究中心 (CSES) 主任维克多·尼 (Victor Nee) 教授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共同主持的“杭州模式研究”课题组中外专家。

“杭州模式研究”是一项由中美双方学者共同承担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近年来，杭州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相继荣获《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世界银行”中国最佳外商投资城市、《了望》东方周刊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美的五大湖（西湖）等荣誉。特别是，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民营经济发达、创新产业集中、社会和谐安定、环境持续改善”等特点，成为和谐发展的典范。因此，极具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已经引起国内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杭州模式研究”课题将系统、深入地阐释杭州市“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模式，提炼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CRPE 观察

百度暴跌沉舟 NASDAQ 第二次互联网泡沫破裂？

9 月 14 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网络股百度股价暴跌 28.4%，收于 81.32 美元。在美国上市一个多月以来，百度股价从最高时的 153.98 美元下跌到 15 日的 81.32 美元，累计暴跌 47.18%，百度 CEO 李彦宏的个人财富也大幅缩水，难道互联网的泡沫破灭时代又将来临？

泡沫产生与 2000 年如出一辙

当百度股价超过 150 美元时，有人说“百度疯了”，因为它的市盈率已经达到 2000 倍以上。许多美国投资者追高买进百度的理由是它的概念，因为它是“中国的 Google”。百度的商业模式几乎与 Google 一模一样，通过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向企业收费。2004 年百度刚刚实现盈利，每股收益才几美分。但是美国投资者看好中国 13 亿人口的广阔市场，看好中文搜索引擎的巨大增长空间，百度才能以 27 美元的发行价上市之后暴涨到 150 美元以上。

过高的市盈率以及离奇的股价，必然招致投资者的卖空。当年新浪、网易等首批中国网络股去纳斯达克上市时，一度也风光无限。新浪突破 80 美元，网易突破 100 美元，但是最后都要拿业绩说话，2000-2001 年度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均未实现盈利，股价也一落千丈，跌至 3 美元以下，网易险遭纳斯达克摘牌的命运。

暴跌 28% 拖累科技股下挫

互联网经济正在经历自 2000 年以来的第二次最严峻的考验，引发这场危机的很可能是一家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百度，而国际著名投资银行 Goldman Sachs (高盛) 也可能由此成为在这场“皇帝的新装”剧中那个无意中说出真话的小孩。

本周，在美国那斯达克市场上，“百度泡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退。这只上市不到三周的中国网络公司股价一周内几度浮沉。周初因 Morgan Stanley (摩根士丹利) 看好中国网络股的报告，百度股价在 13 日一举冲上 110 美元大关，

此价格较上市时 27 美元的发行价格大涨 4 倍。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后作为该公司的主承销商的高盛公司却在此时抛出质疑其高股价的研究报告，令百度股价随后一路下跌至 80 美元。

高盛在对百度的评级中认为其业绩“低于市场表现”。高盛分析师 Anthony Noto 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虽然看好百度的业务前景，但无法认同其股价。即使给予百度较高的评级，也无法支撑它现在 110 多美元的高股价，其股价趋势可能向下。”高盛暗示，百度的合理股价为 27 美元，即使按最佳的分析模式判断，其股价最多只值 45 美元。

受此报告的不利影响，百度股价当天大跌 32.27 美元，报收于 81.32 美元，跌幅高达 28.41%。在百度的拖累下，美国股市科技股遭到投资者的集体沽售。当天，纳指以全日低点收市，下跌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5%。同属搜索引擎概念的 Google 和雅虎分别下跌了 2.8%、1.5%。网络股亚马逊和 eBay 的股价也随之下滑，亚马逊跌 1.9%，报 43.1 美元；eBay 跌 1.6%，报 37.66 美元。

2005 年 9 月 16 日《北京现代商报》

【CRPE 观点】 虽然，据此断言所谓的“互联网的泡沫破灭时代又将来临”显然过于轻率。但是，根据本人的认识：“互联网股票市场迄今为止，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因此，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可想像！一切均会发生！众所周知，只有有效市场才能为企业进行合理定价，而有效市场首先应该是一个信息有效市场。互联网公司作为新兴企业类型，投资者对其的认识远没有对传统企业那么深刻和明确，犹如 18 世纪 20 年代英国的投资者面对“假发公司”和“永动轮公司”，崇拜得五体投地，损失得唏哩哗啦！这样的评论，的确会使人想起 2000 年开始的科技股泡沫。总之，请记住本人在当时曾留给学生们的一句警言：NASDAQ 绝不是一个成熟市场，它不会比 A 股市场好多少！（渔民）

10 强县昆山称霸 珠三角综合竞争力不敌长三角

最新年度的全国百强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测评结果已经揭晓，与去年相比，珠三角区域的顺德在连续 4 年位居榜首之后，让出了排名第一的宝座。

替而代之成为新霸主的是长三角区域的昆山市，这也是昆山第一次登上榜首位置。除了昆山和顺德排名第一、第二之外，第三至第十位的排序分别是江阴、

张家港、常熟、南海、萧山、武进、绍兴和太仓。显然，在 10 强县排名中，长三角区域的发展优等生占据了 8 个名次，而苏南地区在 10 强中优势也特别明显，拥有 6 个名额，显示了强大的基础实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10 强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50000 元，人均财政收入 2900 元，已经在全国率先进入全面小康水平。

不过，有关统计也显示，珠三角区域的县(市)在和长三角区域的县(市)相比，其综合竞争力已经不占据优势了，10 强县排名就是一个信号。

这一 10 强县排名中的新变化值得分析，因为这有可能预示着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新的动态。首先，从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来看，上海对周边的意义将进一步扩大。目前，苏南地区已经完全实现和上海在骨干交通体系方面的联网，从上海中心城区抵达昆山和太仓市区的时间只需要一个小时。而至其他苏南地区的发达县市，也只需要 2 个小时左右。这说明，上海和苏南地区已经可以按照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来进行“十一五”规划的布局了。

如果这一势头发展下去，随着崇明岛开发战略的实施，苏中地区也会加速和上海的接轨。这有可能使第 6 城市群的概念继续扩大，而苏南地区在 10 强中优势也会进一步发展，我们也希望苏中地区能够出现几个进入全国百强县(市)排名的新县市。

其次，技术的优势显现出不可替代的后发效能。我国经济要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有利态势，必须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超越式的进步。在这方面，除了上海市以外，江苏省和浙江省也都加大了产业技术研发的力度。

值得指出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苏南地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靠来样和来料加工获取利益，主动权基本掌握在给予定单的外方合作者手中，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有土地成本和工资水平。这种发展模式在开放之初难以避免，但决不是一种值得继续维持的发展模式。所以，两省一市都高度重视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开发。

而在技术与产业的结合方面，江苏省是最为出色的，而且由于应用范围得当，发挥出了县(市)的积极性，使得最新的科研成果能够及时落地。在研发的带动下，苏南地区能够出现 6 个名列 10 强的县(市)也就不难理解了。技术和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意义还在于增强从业者的收入水准，并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也能够进行产业升级。因此，该区域没有发生珠三角区域业已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第三，这一区域接受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更加直接。我们必须承认，在现阶段，外来投资依然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在接受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上，我国各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也不相同。以第 6 城市群区域的基础设施、市场景气、研发人才和信息交流等整体优势而言，它更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与此同时，随着东北亚经济景气的好转，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资本也恢复了投资的活力，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扩大对第 6 城市群区域的投入又是极为合适的。

而在珠三角区域，外来投资地的来源显得比较单一，15 年前是以港台为主，15 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以港台为主。而我们并没有发现港台产业资本在技术研发层面的后续优势。所以，没有更高层次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介入，珠三角区域的县(市)综合竞争力将进一步下降。

(2005 年 9 月 23 日《国际金融报》 作者：王泠一)

【CRPE 观点】：全国 10 强县市排名的变化表明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县域经济的竞争越来越融入区域经济争竞之中。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发展势头明显超过珠三角地区带动上海周边县市经济的发展已日益凸现。长三角经济增长核心的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贸易、航运和经济中心既依托周边区域的腹地支撑，又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腾飞，显示出极强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竞争不仅受两大区域初始经济规模的累积循环带动作用，而且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内陆腹地支撑的差异将对这种累积循环效应产生加速作用。可以预见，随着要素流动的日益完全，在“规模经济 + 地理条件”双重作用下，长三角地区县市的发展潜力将日益超过珠三角地区。(朱希伟)

2005 空调年度白皮书推出 27 个空调品牌又消失

在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与中国电网共同举办的“2005 年度空调行业盘点暨流行趋势发布会”上，国家信息中心资源开发部推出了“2005 空调年度白皮书”，对 2005 年度空调市场进行了总结。

“白皮书”指出，空调库存仍将成为制约 2005、2006 年度空调市场的一个大问题，去年年底估计空调厂家有 1200 万台的库存空调，市场情况可想而知。

白皮书预计 2005 年以后,空调市场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2005 年平稳增长的趋势,大幅度变化的可能性很小。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在对全国 106 个城市、750 家专营、百货商场月度销售数据进行认真比对后认为,2005 空调年度价格变化有三个突出特点,首先,2005 空调年度整体空调价格略有上升,但增长幅度低于 5%;第二,2005 年整体空调价格依旧是呈现逐月下降趋势;第三,空调价格的变化决定权掌握在经销商手中,经销渠道对生产企业的制约作用在终端零售价格上体现明显。“白皮书”认为,今年上半年空调零售价格逐月下降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流通渠道对整体市场价格走势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外市场,2005 年 1—7 月份空调出口价格平均 160 美元/台,而且从 1 月份开始逐月稳步递增。在摆脱了反倾销的不利影响下 1—7 月份空调出口价格均好于去年。

市场的变化导致空调品牌竞争更加残酷,据悉,在国家信息中心监测范围内,2005 年度空调品牌共计 69 个,与 2004 年相比消失品牌 27 个;而在 69 个品牌中,重点城市市场占有率不到 1%的品牌有 48 个,占全部品牌的 69.56%。

(2005 年 9 月 23 日《中华工商时报》作者:张筱梅)

【CRPE 观点】: 根据 Bain 对 CR4 (行业前四位品牌的市场份额之和) 的划分,研究表明我国的产业市场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偏小,多个产业存在过度竞争。空调制造业总体投资过热,产能严重过剩,产业过度进入十分突出。与供需失衡相伴随的是市场的无序竞争,企业同质化竞争中丧失了差异性优势,为争夺市场份额偏离了品质,选择价格竞争,导致产品研发与创新的动力日益衰退。2005 空调整体空调价格略有上涨和品牌数量的减少与部分企业的退出,反映了市场集中度的开始提高,以及从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的日渐转型,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今后企业应加强基础投入,积累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产品创新和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同时在广告、促销、服务和形象等方面实行产品差异化战略,以获得自主品牌竞争优势;并从以单一的国内市场的竞争转向内外市场为一体的国际竞争。(严建苗)

11 个省市取消城乡户口界限 北京暂未列入其中

日前中央综治委在会议上传出消息,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26 日公安部有关人士介绍说,目前全国已有山东、辽宁、福建等 11 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北京暂不在其列。

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 25 日在中央综治委 2005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

针对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26 日公安部有关人士说,目前这一规划还没有明确的实施时间,但这项规划是中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公安机关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

目前有的省市已经逐步启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改革。2003 年,湖北省选定在武汉、襄樊和黄石三市为试点,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统一登记为“湖北居民”户口。2004 年,山东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费。

(2005 年 10 月 28 日 《北京晚报》 作者:王蔷)

【CRPE 观点】欣闻此讯,顿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进展确实很快,但转而细数一些户籍改革进程比较快的省份和地区的工作,却又难以附掌。一些地方在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界限,实行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形式”的竟相比攀中,是存在一些问题。户籍改革的目的是不仅仅对户口登记形式的改变,而是要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劳动人事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等结合,以提高人口的流动性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样考虑,北京暂时没有比攀加入 11 个取消城乡户口界限的省份,应该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改革态度。(王志凯)

热点透视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评价与路径建议

赵 伟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实践，已有十数年时间²，近五年以来，由于国家“走出去”战略创造的有利环境而获大的进展。绝对意义上来看，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成效显著，但相对意义来看，不能否定如下事实：无论与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相比较，还是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规模相比较，民营企业国际化成效都不可谓很大。客观地说，中国民营企业因其从事主体产业特点、制度环境以及经营者素质等因素，国际化不可刻意模仿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做法，必须另辟蹊径。这里拟就以下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1）如何评价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2）民营企业国际化方面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3）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可行路径建议。

一、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评价

近年以来关于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报道颇多，而在众多民营企业国际化案例中，浙江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大有“独占鳌头”之势。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究竟如何？就是说究竟发展到了哪一步？得有一个客观评价。评价可简可繁，但在最简略意义上，可以三个指标为依据：

第一个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包括绝对规模与相对。客观地来分析，虽然全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就国际化的关键指标即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来衡量，无论与总体的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进程相比，还是与国有企业国际化相比，都要逊色的多。国家商务部会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9月份发布的首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揭示，截至2003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332亿美元。这些投资的发起主体，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中央管理的企业拥有九成以上的投资”；另一个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私有企业崭露头角。”同一份统计公报揭示，若按照企业数量比例衡量，则非国有企业占多数，但若按照投资额衡量，则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压倒优势地位。报告显示：截止2003年底，全国共有3439家企业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国有企业占总数的43%，私营企业占10%，外商企业占5%，其余为股份合作制等企业。但私有企业占总投资的比重，仅为1%强。即使在私有企业投资“突飞猛进”的2003年，也只占到当年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2004年这一格局当无明显变化。

【2005年2月商务部发布的关于2004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称：全年实际外投36.2亿美元，累计370亿美元，其中“中央管理企业及沿海投资拉动作用大”。其中中央企业应为国有大型企业。】

第二个是国际化进程，即企业国际化总体上所处阶段。迄今为止，虽然不乏民营企业嬗变为跨国公司雏形的成功例子，但大多数民营企业国际化，仅进入国际化的第二、三阶段。一般认为，企业国际化一般须经历四个阶段，分别为：

（1）“零星出口阶段”，（2）“通过代理商经常出口阶段”，（3）国外设立营销机构阶段，以及（4）“国外设立制造企业就地制造与销售产品的阶段”。五年前我们（赵伟，2000）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即使在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最快的浙江省，大多数民营企业尚处在国际化的第一、二阶段，少数处在第三阶段，处在第四阶段的可谓凤毛麟角。时过五年，可以做出如下判断：许多民营企业正在尝试国际化的第三阶段，但处在第四阶段的企业依然寥若晨星。

第三个是进行国际化实践的民营企业状况。民营企业国际化近年涌现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企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一两年的企业跨国并购中，中国民营企业大有先声夺人之势。涌现了浙江万向与华立，北京之京东方与联想等较有影响的并购案例。一时间，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成了经济界的热门话题。然而，客观地来分析，除了联想而外，其他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多半带有“雷声大雨点小”的征兆。并购案值一般也就几千万到1亿美金不等。不要说与国际上近些年一般并购案值规模不能相提并论，就是与国内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跨国并购与对外投

资，也不可同日而语。像中石油、中石化、首钢、宝钢、中远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跨国投资动辄数亿乃至十几亿美元，相形之下，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显得小而又小。即使民营企业国际化声势最大的浙江省，民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仅有20多万美金！

综合上述各方面的信息，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依然处在尝试阶段，这一点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二、民营企业国际化：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在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不少问题产生自认识误区。三个认识误区值得注意：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民营企业也是“走出去”国家战略所依托的主体企业或“国家队”之一，因此对政府战略与政策支持期望值过高。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刚跨入新世纪之际，就推出了“走出去”战略，这个战略的确是作为国家战略推出的，意在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目的在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五年以来，为落实“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沿海“有条件‘走出去’的区域”政府，先后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说，无论是国家“走出去战略”也好，还是支撑该战略的相关政策措施也好，给予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支持或激励，都可谓微乎其微，与民企及关注民企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的各方的预期相去甚远。但在我看来，民营企业国际化不应对国家战略与政策太多的企盼。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所依托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并未被纳入“主要企业”之列。2000年推出的“走出去”国家战略曾明确提出，跨国投资与跨国经营“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五年多以来的“走出去”战略实践，也大体贯彻了这个精神，国有大中型企业事实上主宰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在此情形下，要期待国家“走出去”战略给予民营企业特殊照顾，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个方面，就产权性质与企业决策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来分析，产权非国有的民营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国际化决策本质上从属于企业家及投资人的自私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理论上来看，国家“走出去”战略首先着眼于国家利益，国有企业与此利益一致（同样是理论上的）。因此这种战略下的企业国际化支持性政策，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民营企业的利益。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有利国内政策环境，只能靠经济体制改革创

造。实际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私有企业主宰，但企业国际化的政府政策大多取中性乃至中性偏限制型的，而非一味鼓励型的。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民营企业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可以大规模地实施国际化扩展尤其是跨国并购。事实则不然。事实上，我国民营企业从事的主体产业，大多与当代企业国际化尤其是企业借助并购进行的国际化产业相悖。当代国际并购的主体产业为第三产业，这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3-2-1特征相一致。即使在制造业，也是一些新兴产业。我国的情况是，工业化尚未最终完成，产业结构尚未发生根本逆转。在制造业，民营企业大多从事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我们知道，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往往经历两个阶段变化：第一个阶段是“非农化”或“二产化”，第二个阶段是“三产化”。在前一个阶段，产业结构完成由1-2-3向2-3-1转换，在后一阶段则发生由2-3-1向3-2-1的转换。后者是发达工业化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历史地来看，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以金融、保险、信息、商品零售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成了发达国家最重要同时最大的产业。与产业结构的上述演进相适应，早期并购发生的主要行业，大多位于“二产”，越是到了近期，“三产”并购越是重要，全球第五次跨国并购则以第三产业企业并购为主。中国则不然，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产业结构刚刚完成“非农化”演进阶段，呈现强烈的2-3-1结构特征，即“二产”产出最大，“三产”其次，“一产”最小。即使在那些有一定条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沿海发达省市（比如上海与浙江，），产业结构也未完成上述转换。与此种产业结构特征相一致，加上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中国的“三产”国际竞争力当最弱。这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充其量只能在“二产”兴风作浪，而难以加入国际并购主流产业，即第三产业。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依托“二产”中一些传统行业，短期内要在国际化上获得大的突破，也是不现实的。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民营企业国际化实践，绝大多数是成功的。事实也并非如此。事实上，民营企业国际化的一些案例，有被过度推崇、渲染之嫌。这可能对民营企业国际化的下一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最大的不利是可能导致民营企业国际化的盲目冲动。其一，一些跨国并购案例，利弊比率究竟如何，尚不甚清除，但却有些过分渲染倾向，过早地宣布“成功”。比如华立集团并购菲利普半导体公司CDMA手机分部，连华立老总都说得失参半，出价太高，所获技术面临

淘汰，但国内不少研究者却渲染此举“大获成功”，并获得了“核心技术”。同样得到过分渲染的案例还有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会社TFT-LCD业务。其二，浙江民资海外办市场，后果究竟如何，也有些被过早宣布“政绩”之嫌。一度作为“走出去”办海外市场“样板”宣传的“巴西中华商城”，后来倒闭，致使300万美元国有前期投资化为乌有。西班牙“烧鞋案”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办海外中国商品市场后果难料，而俄罗斯一再发生的查扣“浙货”案件，也强烈表明民营资本办海外市场需要反思。

上述认识或研究上的误区，导致了对民营企业国际化的过高预期。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府参与度较高的经济，过高预期往往误导政府决策。

三、民营企业国际化：路径建议

民营企业国际化已经尝试了当代企业国际化的所有可能形式，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绿地投资，另一种是跨国并购。在我看来，除了这两种主流形式之外，还有第三种形式，这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外源化”（outsourcing，有译作“外包”）形式，这是企业国际化的一种新的趋向。在这种形式下，一家企业可将重要业务通过国际合同发包给别国企业，由此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借助这个网络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这方面一个广为引用的经典例子要属芭比娃娃的生产过程。这个由美国马太尔公司经营的玩具的生产，目前由如下系统组成：原材料（塑料、头发等）购自日本和台湾，模子及装饰用油漆购自美国，服装购自中国，组装也在中国完成。最后由香港中间商交付马太尔公司推向市场。这种将分散于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部件或服务汇集于一地，制造与提供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过程，被称为“外源化”。

不仅像芭比娃娃这样的玩具，而且像汽车、船舶及飞机这样的现代运输设备、发电成套设备，以及计算机制造等产业，都在采取“外源化”方式：一家龙头企业将产品部件分包于世界各地的不同企业生产，最后汇集起来组装并销售。WTO早几年前的《世界发展报告》（1998），就曾留意到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新趋向：仅有37%左右的造价是由美国企业创造，其余都是通过“外源化”形式由分散在多国的企业完成的。

中国企业多数是以跨国公司外源业务承揽者的身份参与外源化的。最重要的形式是OEM（“贴牌制造”）。典型的OEM方式为：拥有原创设备的OEM加工

方（受委托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用自己的设备为其加工生产产品，而后贴上委托方商标交货。整个活动中，加工方只获得加工费用，自己无权经销该商品。这也是外源化最重要的形式。目前OEM产品涵盖了我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消费品市场。从服装、鞋类、玩具、到家用电器，从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到电脑、建筑材料等，无所不包。其中世界服装巨头皮尔卡丹等服装绝大部分都由中国的广东、浙江等省的厂商为生产。而著名运动鞋品牌耐克60%的运动鞋由中国生产，美国通用电器将10万台空调的生产转向中国；2000年到2003年，中国IT外源化服务市场规模由19.79亿人民币，而当年全球软件外源化市场规模则高达504亿美元。到2003年也仅为42.6亿元。权威机构预测，2003—07年五年，中国IT外源化服务市场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31.8%以上。到2007年，IT外源化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124.93亿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第一家“走出去”的民营制造企业，还是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较为成功的实践，恰恰是从参与国外企业“外源化”起步的，其中万向集团的国际化最具典型意义。仔细考察万向的国际化之路，便不难发现，这个企业的国际化，大体上依循了从外源化低端承包方到“反客为主”实现国际化经营的路径。具体来说，万向集团的国际化进程经历了四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承揽国外汽车零部件经销商“外源化”订货。按照万向集团“厂史”材料，1984年该厂接到第一份海外汽车万向节订单，开始涉足国际市场。此后十余年时间，几乎完全靠海外订单扩大出口。这些订单，几乎全部属于欧美汽配经销企业的“外源化”业务。其中美国市场最重要的外源化采购商是舍勒公司。第二步：设立海外销售机构，实现产品营销目标市场本地化。1994年，万向在美设立分支机构，开展本土化营销业务。第三步，“反客为主”，并购国外汽配产品经销企业，实现由外源化业务低端承揽商到中端采购商的跨越，并打入美国汽车龙头企业“外源化”采购系统。2000年，万向成功收购美国知名汽车零配件经销公司——舍勒公司并成立万向美国公司，由此打入了汽车制造商与零部件生产商之间的外源化中介环节。第四步：从汽配零件经销迈向异国研发与跨行业投资，实现多国多元化扩展，建立跨国公司框架。2001年万向成功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 21%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万向声言，通过此类资本运作，不仅拿到了被收购方的专利技术，提升了制造能力及产品档次，而且还获得品牌和销售渠道，把产品打入了西方主流市场，

并逐步推广“万向”品牌。

这种由参与“外源化”到主导“外源化”，进而实现国际化扩展的路径，显然是目前正在从事OEM的大量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可行路径之一，也当是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首选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4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商务部网页，2004年2月23日报道。

赵 伟：《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与典型案例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赵 伟、周飞燕：“外源化”及其经济学分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8）：30-34。

赵 伟：“当代跨国并购浪潮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学会2004海口论坛讲演稿），载商务部网页。

赵 伟：《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原载《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8期

【作者：赵 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RPE教授】

时事评点

十六届五中全会描绘“十一五”蓝图

【编者按】：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于 10 月 11 日下午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凸显了新发展背景下的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而备受关注。她将深刻的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也影响着包括民营经济和我们日常生活在内的方方面面。《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的评论文章，从十一个方面总结了《建议》的亮点与创新之处，对我们深入解读中央关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走向，颇具启示。

“十一五”规划建议透出十一大亮点 确定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文章

建国 56 年来，中国的五年计划从未像“十一五”这样如此吸引国内外关注。“十一五”规划将以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等诸多亮点，确立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政策取向。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于 10 月 11 日下午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立了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从《建议》内容看，与之前的十个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体现出诸多亮点。

一、社会公众首次广泛参与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多年间的“五年计划”，从来没有像“十一五”这样

牵动 13 亿中国人心，并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从来没有像如今中国政府高层如此重视民众对于该规划建议的参与。

2005 年 7 月 27 日，洋洋 8 万言的《中国公众对编制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意见建议书》出台，并上报国务院。该建议书的 412 万中国公众建言者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特别行政区，也包括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不少建议将体现在“十一五”规划中。

这份 8 万言的建议书源于此前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公开问卷调查，即由中华环保联合会，通过《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及中华环境公众信息网发布的公众调查问卷，征集民众对“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意见和建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承担此次公众调查的问卷回收及统计撰稿工作。

据统计，参与调查的公众平均年龄为 29.7 岁，71.1% 是男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 67.6%。他们主要来自学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军人武警和国有企业。其中超过 1/3 的参与者是学生（包括 25% 的大学生和 10.4% 的中学生），平均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占 8.2%。

香港《文汇报》为此以《“十一五”规划纳 412 万人建言》为题，分析说这凸显了该规划报告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出“科学性”。而早在两年前，专门负责五年规划编制工作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曾公开发布消息，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十一五”规划的前期研究课题。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将未来发展规划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和购买方案。

据了解，这次招标主要面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行业协会及国际组织等；愿意参加投标的单位按照规定，可根据自己的研究优势确定研究课题和重点，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申请书》；发改委专门组织成立了评审小组，对投标单位的申请方案和研究力量进行评审，择优确定中标单位，并于 2003 年 11 月 30 日前下达了项目中标通知书；后来，中标单位与发改委签订了项目协议书，规定在 2004 年 6 月前完成研究报告初稿。

一直以来，中国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多在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部委的研究机构中进行。由于缺乏民间的参与，制定出的政策与法规有时难免未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而更多地是反映了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

据悉，“十五”规划编制时，政府也曾向社会征求建议，但当时只是希望各界“献计献策”，其性质与招标完全不同。对于这次招标，《中国新闻周刊》当时

以《“十一五”招标：到民间“买思想”》为题作过专题报道。

公众和众多研究机构的广泛参与，不仅说明新的五年规划制定的过程拥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编制的内容会更加科学，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决策的民主性在不断增强。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曾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已经使国家规划编制和实施的体制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计划经济下，规划具有指令性，实现规划目标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性质、作用、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实现规划目标，也主要依靠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行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无疑大大增强了规划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二、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

这次五年规划，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中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2002 年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随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综合配套改革措施，以崭新的面貌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好评，并被海内外盛誉为“胡温新政”。

新领导集体执政的着力点，是从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出发，所谓“穷人经济学”，寻求整个社会发展的公平与和谐，树立了良好的“亲民政府”形象。

新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执政风格，“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顺应了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和民心所向，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六合相应”。

新领导集体上任的第二年即 2003 年，即开始着手启动制定“十一五规划”，这在以往的五年规划中也是不多见的。应该说，“十一规划”是以“胡温新政”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更为全面、集中和完善的表达和展示。

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坚持发展的主线一脉相承，以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贯穿始终。这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和谐社会是目标，科学发展是手段。“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更是硬道

理”，“科学地发展和谐社会是真正的硬道理”；不科学地发展难免不和谐，不和谐地发展肯定不科学；发展不等于片面的数量、速度和规模的扩大和增长，“科学发展”一方面是要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求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要追求“理性的繁荣”，“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发展。

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看，科学发展观是其最重要的指导方针。它意味着，中国要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加依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发展。也就是说，不仅要既“多”又“快”地增长，还要既“好”又“省”地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总书记 2003 年 4 月 10 日到 15 日在广东非典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的。当时，他鼓励广东要万众一心战胜非典，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

当时的提法，是全面科学发展观，要求广东要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由此可见，胡锦涛同志在当时就全部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两个月之后，即 2003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击非典总结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次日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报端上，并风行全国。一年之后，当胡锦涛同志在 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讲话时，科学发展观已成全党全国的共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 7 月 25 日和 9 月 29 日相继召开的两次会议强调，制定“十一五”规划，做好“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坚持“六个必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首次由“计划”改为“规划”

与过去十个“五年”明显不同的是，在名称上，第十一个“五年”由“计划”变成了“规划”。这几乎成为近期有关“十一五规划”报道的一个焦点。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辛鸣认为，虽一字之差，内涵却不尽相同，显示出党中央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已有变化。

《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计划”和“规划”：“计划”是指工作或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显然，

后者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长远性。

以“五年”为单位进行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模式，起源于前苏联。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学习，自 1952 至 1953 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来总理率团的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自 1953 年起实施。

“一五”计划主要是指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事无巨细，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经济增长指标，从工业总产值增长 98.3%、手工业增长 60.9%、大型工矿项目施工 694 个到具体的钢铁产量增加多少、煤炭产量增加多少等等。翻开以往的五年计划，各类指标的具体程度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2003 年 9 月 18 日，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十一五”规划，要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要抓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突出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布局、战略措施和重大政策，不宜搞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改变以往无所不包、涉及领域过宽的状况；强化指导和约束功能，增加制度创新内容；在编制程序上要建立规范化的民主制度、衔接制度、论证制度、公布制度以及备案和评估制度。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但过去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五年计划从“一五”推进到“十五”，其中的强制性和指令性逐渐消失，或者说主观性的成分逐渐减少了，而客观性的成分增多了。而计划变规划，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了。

四、人本化改革

国计当为民生。早在 2003 年 9 月 18 日，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曾表示，“十一五”规划当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中国的发展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发展应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分享到经济进步带来的成果。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党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高度

概括。它明确告诉人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际上，“以人为本”本身并非我们今天的创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在《管子·霸业》中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也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但在某一发展阶段，不经意中迷失了发展的终极目的。

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则明确了“为谁发展”的问题。人，既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还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价值的提高。

经济伦理学者、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姚轩鸽就“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解释时指出，“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的特点或实际出发，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体现人性，从人出发，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尽量减少异化，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

“以人为本”新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重建“人与人的联盟，人与社会的联盟，人与自然的联盟，人与终极价值的联盟”。

“十一五规划”编制的出发点，已从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具体体现就是，从过去单纯以增加 GDP 为出发点，变为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重大举措，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

五、政府回归公共职能本位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能，这后两项任务是政府极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当前较为薄弱的环节。

“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在社会服务、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履行公共职责。

目前，社会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期待包括，政府在行政管理、财税体制等方面

出台相关举措，科学界定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各级政府还要进一步转换工作方式等。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看，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已经得到强化，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计划到规划的转变，也进一步表明政府明确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政府只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对立的一个部分。

当然，政府职能转向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责，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更轻松，就如同裁判员并不比运动员“好当”一样，事实上，政府面临着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新挑战。

六、共同富裕提上日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 20 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与以往相比，更强调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体现了中国政府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的决心和努力，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是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后，五年规划制定理念所作的一个重大调整和历史跨越，表明中国执政党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首先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启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经济在保持多年的持续高速之后，目前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其他社会差别持续拉大的问题，成为新时期的重头戏。

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 1000 美元，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3000 美元。从国际经验看，这一阶段常常会发生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

据测算，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 GDP 差距已扩大至 10 多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 2%，而 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 40%以上；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 5 到 6 倍。目前，中国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0.40。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是过去 20 多年里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说：“市场经济只承认强者，所以必须要靠政府动用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弥补市场失灵，扶助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创造机会平

等的社会机制和环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光建则认为，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共同富裕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追求。它的核心是“共同”，是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保障。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中国将不懈追求公平的增长、均衡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怎样解决教育、卫生、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怎样使经济增长惠及大部分人，减少发展成本，是中国十一五规划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前，中国已经有 20 多个省份取消了农业税，在“十一五”期间，“农业税”这个概念将彻底走出历史舞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 3 月的人大会上，宣布免除国家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教育部官员也透露，在 2010 年前，中国将在农村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将使农民负担每年减少约 1000 亿元。

新的五年规划已经从政策取向上坚持普惠制原则，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七、区域经济纳入国家五年规划

9 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说，在即将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国家重点关照的四大经济区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

据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分析说，国家今后考虑的区域规划重点是跨省之间的经济合作，珠三角因为局限于广东，规划应该由广东省来做。珠三角表面上从中央规划方案上的淡出，实际上是在透露另一个信号，即珠三角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经济区域，基本可以放手自立发展，不需要所谓的政策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的波浪型梯度式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由南往北、由东到西，由四周到中部的推进格局。在由南往北路线上，从 1980 年代的以广东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经济区，到 1990 年代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直到今天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的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区，同时包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由东向西路线上，从东部沿海区到西部大开发，到今天具体的成渝西南经

济区(西三角)。将成渝地区列入“十一五”规划,显然是加快西部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一步。在由外及内路线上,中部崛起继东部沿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战略之后提出。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加上行政割裂和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以及财税体制弊端,不仅国内统一大市场困难重重,而且区域市场的统一障碍也不少。因此,注重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定位,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最终形成扫除障碍,是“十一五”规划要重点突破的领域,因此将区域规划列入“十一五”规划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内容也就在情理之中。

八、自主创新被提升至新高度

目前,中国已是主要资源消耗量的世界第一大国。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从2002年至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来自中国。2004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接近50%。官方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约达7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仍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优惠政策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有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75%靠技术进步,25%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而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国主要行业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基本依赖进口。

当今世界,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企业的竞争,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较量,日益集中地表现在科技竞争方面,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举措。

早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的重要论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坚持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今年7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强调,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十一五”规划专程赴豫赣鄂三省调研,考察的重点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指出,中国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总体来看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九、从体制上寻找治本之源

如果说, 上世纪 1980 年代初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90 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两次大的体制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两次大飞跃, 那么, “十一五”期间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央把今年确定为“改革攻坚年”, 而综观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内容, 不难发现, 扫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成为重点突破口。4 月 23 日, 来自国务院 40 多个部门和全国 4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 and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改革部门(体改办)以及部分特邀单位参加了在深圳召开的 2005 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其主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200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实践表明, 我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之所以屡屡得不到解决, 其深层原因都在于体制机制未能理顺。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指出, 当前改革要认真梳理复杂利益关系, 着力解决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难题, 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个方面: 如何建立健全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问题、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问题、产权多元化格局下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无形障碍的克服与有形监督的体系建设问题、地区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混合所有制经济格局下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调控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实现自我保护的制度保障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相互衔接问题。

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性障碍, 仍制约着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十一五”期间, 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将从体制机制上实现新的突破。

十、创新发展模式

经过 20 多年的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城乡差距、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环境恶化、行政腐败、效率低下等多年积累的问题开始集中暴露; 2003 年以来出现的投资过热问题, 使中国旧的发展模式的弊端表露无遗。

“十一五”规划的出台, 将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 也是

对新发展模式的整体尝试。“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的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的新观念，将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得到鲜明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人为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等，将成为“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这些关键词所做的描述也正是新发展模式所涵盖的核心内容。

十一、走出“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从“一五”到“十五”50多年来，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不断摸索、不断尝试的道路，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十一五规划”可以说是在继承创新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一个相对成熟和较为完善的发展与改革理论体系下进行的更为明确的实践。“十一五规划”固然是前五个五年计划的延续，但这五年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极为重要。在2006年起的五年里，中国能否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将决定到2020年能否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到本世纪中叶能否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十一五规划”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已开始走出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时代背景、民心所向的清晰的道路。



背景资料：

“五年计划”回顾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

“一五”计划是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

“一五”成就：“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到1957年底胜利完成，使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二是 1956 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三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为以后相当长时间留下后遗症。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年-1962 年)

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式通过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明确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二五”目标：“二五”的主要指标是：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 35%，钢产量 1962 年达到 1060 万吨到 120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五”35%增长到 40%左右

主要问题：“二五”在制定和执行中出现严重冒进倾向，许多计划指标不断修正和大幅度提高。由于 1958 年来的“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 年-1970 年)

1966 年到 1970 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三五”计划是从 1964 年初开始研究和编制的。“三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三五”成就：“三五”计划期间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了计划。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额 16.2-14.1%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 2.2%，工业总产值超额 21.1%，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 6806 万吨，发电机组存量 860.4 万千瓦…

主要问题：尽管“三五”绝大部分经济指标完成了计划，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积累为以后的国民经济大发展设置了障碍。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 年-1975 年)

“四五”计划于 1970 年开始进行编制。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制定 1970 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会上研究、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四五”成就：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 101.7%，其中农业完成 104.5%，工业完成 100.6%。主要产品产量完成的结果是：粮食 103.5%，棉花 96.5%，钢 79.7%，原煤 109.5%，原油 110.1%，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101.6%，财政收

入完成 98%。

主要问题：1973 年 7 月国家计委修订“四五”计划。《修正草案》对主要经济指标进行了调整，不少指标有所压缩，钢产量下调到 3200-3500 万吨，后又调到 3000 万吨。

✚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 年-1985 年)

1975 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安排了“五五”计划。

“五五”成就：1977 年至 1978 年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恢复或者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1977 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 5055 亿元，超过计划的 4.4%，比上年增长 10.4%。1978 年社会总产值为 6846 亿元。

主要问题：此时表现出明显的冒进倾向，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规定的具体指标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新的失误。

✚ 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 年-1985 年)

“六五”计划的编制时间较长，1980 年 2 月，国务院决定重新制定中长期计划，1982 年 12 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

“六五”成就：“六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1%，国民生产总值 1985 年达到 7780 亿元，与 1980 年相比平均每年增长 10%。

主要问题：“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

✚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 年-1990 年)

1983 年，国务院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5 年上半年拟订“七五”。1986 年 3 月审定完毕，将“七五”提交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七五”成就：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8%，平均每年增长 6.7%，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7.5%，五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44%，平均每年增长 7.5%，进出口贸易总额五年增长 35%，并相应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 5%。在这五年内，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

✚ 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 年-1995 年)

1991-1995 年是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0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八五”成就：在“八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 11%左右，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高出近 4 个百分点，经济波动不到 5 个百分点。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执行的 8 个五年计划中，“八五”计划是中国历次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波动最小的一个五年计划。“八五”期间，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贸易总额累计达 10145 亿美元，比“七五”翻了一番。

✚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 年-2000 年)

1995 年 9 月 28 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建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九五”目标：“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 年，在中国人口将比 1980 年增长 3 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 年-2005 年)

1999 年 6 月 22 日，国家计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十五”规划工作。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会议上说，做好“十五”规划工作，要把握好六个重要原则和四个思想方法。

“十五”目标：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 7%左右，到 2005 年按 2000 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2.5 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400 元。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 40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左右。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增强。

本简讯全部内容可免费登陆
<http://www.crpe.cn> 阅读或者
致信致电本中心索取。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地 址：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四楼

邮 编：310027

电 话：（086）-571-8975-2835

传 真：（086）-571-8975-2835

电子信箱：crpe@zju.edu.cn

网 址：<http://www.crpe.cn>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